

“时间银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赋权机制

孙文中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是当前农村地区应对老年人“权能衰退”问题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由于农村老年人的权能衰退、老年歧视主义以及家庭资源弱势累积等原因,致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遭遇志愿者服务资源的匮乏、老年健康风险的叠加、家庭养老心态的束缚、互助养老服务的成效难以凸显等困境。基于赋权机制,从资源、能动性和成果3个维度,对提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催生动力、激活“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内生动力、培育“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推行动力等方面切入,围绕互助养老顶层设计、发挥模范榜样效应、整合妇女志愿者力量、形成“82”兑换模式、开创继承转让机制等举措,促进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实现农村老年人安享晚年,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权能衰退;赋权机制;时间银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 C 913.6; F 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1-0064-09

一、引言

2019年6月17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该年全球人口中每11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每6个人中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1]。潜在支持比^①的下降,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老年人养老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挑战和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机体不断衰老,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不断下降,又因角色的转变、社会地位的下降、子女问题、经济状况等原因,老年人遭遇权能衰退的问题,这给他们的养老需求的满足带来挑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强调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2],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积极发挥老年人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老龄事业与

老龄化社会的协同发展,促进老年人变“无用”为“有用”,实现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3]。构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互助养老服务,实现老年人之间的自助-互助服务,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能够消解“老年歧视”的社会氛围。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积极参与制度化的互助养老服务的现象尚未多见。这是因为互助养老实践也暂处于无序、自发、不稳定的状态,没有制度化,缺少普适性的经验,难以在代际间传承和全国范围内推广^{[4][23]}。伴随我国农村地区养老需求日益增长,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的滞后,当前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和老年人的自力养老难以为继。同时,“老年歧视”观念使得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推进困难重重。因此,在我国农村地区,从权能

[收稿日期] 2021-0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SH068);厦门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XMSK2019C18)

[作者简介] 孙文中(1981—),男,安徽亳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① 潜在支持比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比率。

衰退和赋权机制的视角,创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路径显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兴起

“时间银行”倡导用户把闲散时间储蓄起来,为有需求的成员提供服务并记录时长,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从中“支取”,予以兑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创新,成为人口老龄化浪潮下提供助老服务和缓解老年照料压力的新思路^[5]。美国最早引入“时间银行”,其设计思路是老年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目的是提升养老质量。美国的“时间银行”成果主要体现在老年服务领域,即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与长老计划^[6]。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的主要服务模式是低龄老人成为志愿者服务成员,为高龄老人或独居老人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多为临时照料,服务时长以积分的形式存储下来,积分的兑换规则相对固定。老年志愿者的积分既可以为自己兑换使用,也可以为自己的直系亲属兑换使用。长老计划起源于美国为老年人提供疾病预防的试点机构,允许参与者运用时间货币支付部分保险费,在定点兑换医疗保险项目的商店,参与者免费获得服务或者给予参与者一定折扣的服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将服务者现在为高龄、空巢等困难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储存起来,当服务者年老需要帮助时,提取时间并得到别人的无偿帮助^[7]。“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始实施,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公众认知度不足、服务队伍建设不力、计量标准不统一、政策法规缺失、持续性发展与跨区通兑受限等^[8]。“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运行不仅依赖于两个基本认同:每个人的时间是等价的,以偿还为基础的“志愿”服务同时还必须满足三个客观条件:承接机构的公益心、丰富资源、高公信力与强运营能力,人口的可持续性,覆盖区域的广泛性^[9]。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互助养老服务的“时间银行”模式必须整合社会资源,划分服务等级并确定兑换标准,推动养老服务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的转变。

(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

“时间银行”这一概念由埃德加·卡恩首先提出。卡恩认为,“时间银行”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度过当时的经济危机,因为相互间的服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经济危机期间短缺的物质救济,同时“时间银行”可以为人们重返经济复兴搭建桥梁^{[9][12]}。英国的“时间银行”模式主要提供医疗服务以及为“时间银行”的会员提供志愿者辅导项目,确保志愿服务质量。以志愿者的力量能够使社区更加幸福,更具有包容性,创建有益的志愿者体验,对受益人及其社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6]。日本的“时间银行”模式主要有自愿义工网络和积极生活俱乐部^{[6][14]}。自愿义工网络通过组织年轻人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在服务过程中老年人之间能产生友谊与信任,这样更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需求。积极生活俱乐部采取积分制,并根据服务的差别来计分,积分的使用既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直系亲属,还可以馈赠他人而且积分的提取没有时效限制。积极生活俱乐部定期为老年人举办讲座,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心理等需求,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总之,国外“时间银行”养老模式有助于挖掘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满足互助养老多元化需求、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增进邻里关系与社区和谐。近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将“时间银行”应用于居家养老服务。“时间银行”模式倡导农村地区老人之间以劳动成果代际接力的方式开展互助养老服务,其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本、构建和谐社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综合效应明显^[10]。“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通过利用个人的社会时间产生新的社会价值,建立市场与政府分配机制之外的社会交换与分配新机制集聚社会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手段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11]。

(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需求的拓展

伴随农村中青年人口的外流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中国农村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政府难以承担全部照护保障任务,农村老年人的储蓄难以应对重大疾病带来的风险,亦缺乏足够的经济

能力购买市场化的专业服务^[12]；另一方面，农村年轻人口长期向城镇单向流动，农村空巢老人的照料资源、精神资源乃至医疗资源存在较大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老年人自发组织或参与互助养老^[13]。国外的“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较为成熟，公众的普及率也很高。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应对老龄化压力较大，所以现阶段需要借鉴国外“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经验与我国的家庭养老、社会养老模式相结合，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化互助养老模式。

此外，老年歧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老年歧视(ageism)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对老年人的成见、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行为，是社会公众对老年人的一种负面塑性和差别对待^[14]。一方面，从老年歧视视角看，人们针对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衰退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衰竭，将他们视为“社会负担”，即他们老了之后，就应该撤离原本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角度看，老年人参与劳动的能力减退，无自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后辈赡养，后辈乃至社会可能对老年人产生一定的歧视。外部环境的歧视加剧了老年人自身的消极观，会产生一种退出历史舞台、被社会抛弃的无能感，使得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意愿降低。在老年人的生命周期中，他们不可避免地经历或长或短的带病期，这期间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以及外部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助推了老年人社会资本的丧失^[15]。

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外流，家庭结构的缩小及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农村社会的未富先老形势比较严峻，老年歧视主义的存在，这些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社会型互助养老应对农村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时间银行”模式是一种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多样化的互助服务，可以补充家庭养老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不足，是推进中国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现实选择。

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赋权机制

(一) 赋权视角

“赋权”(Empowerment)也称为增能、增

权。赋权视角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所罗门在《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中提出，增权是一个处理问题中特殊障碍的过程，是对受到社会污名化群体的重新界定，从而促使他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以达到增强自信和自尊的目的。同时，增权还强调对被压迫群体减少无权化的过程，方法是通过发现“无权的群体”的权力障碍，帮助这一群体消除非直接权力障碍(如形象低落、无助感、宿命观念等)的效果与直接权力障碍来实施^{[16]78}。增权的核心就是权能的增强，其目的在于激发个体的潜能。赋权理论认为，个人经历深切而全面性的无力感，以致无法与环境交流、实现自己；个人周围存在直接与间接的权能障碍，以致无法参与社会和政治、实现自己；权能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增加与衍生更多的个人及人际权能；案主应被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人；社工人员应与案主建立一种伙伴关系^{[17]290}。赋权视角由3个方面构成：资源、能动性和成果^[18]。资源是赋权的前提条件，指有利于赋权的各种条件；能动性是赋权的过程，指能够定义自己的生活选择并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成果是赋权的结果或产出。

农村处于未富先老的状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匮乏，加之农村老年人被视为社会负担，他们在应对自身养老问题时处于权能衰退的状态，因而在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方面，需要动员更多的农村老年人参与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之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如果一味地把农村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权能的退化视为社会负担，这一观念可能造成他们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降低，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进而阻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培育、推行和发展。基于此，需要从赋权机制的角度，创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

(二)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赋权机制

D村是厦门市农村地区的一个行政村，下辖9个自然村，2019年村内人口4300多人，60岁以上老年人573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8%。D村幸福院根据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将老年人分为

康乐型老人、慢病型老人和失能型老人。其中康乐型老人 56 人，占比 9.77%；慢病型老人 495 人，占比 86.39%；失能型老人 22 人，占比 3.84%。

基于赋权视角的资源、能动性和成果的框架，探索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与村庄传统养老资源、农村老人参与互助养老的能动性及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发展的成效。

1. 整合传统的农村内生性资源，促使互助养老的机理顺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1）将青老年的活动和老老年照料结合起来，是基于志愿行为与未来回报的双向考虑^[19]。（2）“时间银行”与我国农村社会盛行的互助互利思想有着内在亲和性。互助互利、助人助己或济世助人的思想和“时间银行”致力于社会成员相互帮助、互补余缺的初衷如出一辙，在思想内核上并无二致^{[5]112}。老年人的思想、理念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时间银行”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能够很好地被老年人所接受，促进老年人对传统文化的更深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文化弱势造成的权能衰退。（3）互助养老建立在“互惠”传统以及“志愿”精神的基础之上，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20]。厦门市在互助式养老方面，倡导邻里互助，发挥老年志愿者的表率作用，引导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身体健康老人帮助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并通过老年协会、老年社团组织，政府购买养老的社工服务项目，广泛动员和吸引老年人参加相关活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 D 村幸福院得到有序实施。大多数老年人具有实现互助养老的愿望，而且他们愿意成为志愿者去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这为实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奠定了良好基础。D 村幸福院具有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定期举办活动，如棋牌、歌唱、舞蹈等休闲娱乐活动；结合节庆日，举办节庆活动，如“幸福杯”老年 80 分争霸赛，每季度举行一次的集体生日会，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定期组织开展健康主题讲座和健康义诊，如开展“夏日防暑与养生讲座”“三高预防讲座”以及医学院志愿者健康义诊活动等。

2. 培育农村互助养老的主体性，催生农村

“时间银行”的文化氛围。“时间银行”模式通过动员农村老年人参与幸福院养老服务，转变他们传统的养老观念，鼓励老人积极参与村庄内部的养老志愿服务。这一做法改变了传统社会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的观念。老年歧视观念可能会对他们的社会参与、经济参与和文化活动造成一定约束，从而给老年人贴上负面的标签。因为作为社会性弱势群体中的老年人极易产生“被剥夺感”^[21]，制约了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能动性。自 2019 年以来，D 村幸福院从“乐享·生活”“乐享·健康”“乐享·居家”3 个内容入手，开展生活照顾、休闲娱乐、健康维护、日间休息、精神慰藉等综合性日间照料服务。同时，整合社会资源，为老人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让老人过上快乐、安康的幸福生活。首先，D 村幸福院在推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方面，积极引导老年人在乡风文明中的主体作用。这些老年人多为 1950 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合作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早期生活于普遍的物质匮乏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是亲身体验到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因而他们身上都保持了勤劳、节俭、诚信、友爱等优良品质。D 村幸福院积极发动老人参与移风易俗、垃圾分类、“八不文明”行为规范的宣传和引导工作中，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老年人由于受到关爱和尊重，也愿意积极发挥余热，带头做好移风易俗的工作，让“除陋习、树新风”成为村民的共识。其次，引导老年人树立自助-互助的意识，有序开展互助养老服务。每年的重阳节，D 村幸福院为村中老年人举办集体生日会，根据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和行动能力，吸纳他们参与互助养老的志愿者组织，提升他们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并对他们进行培训。这一做法能够形成社工策划、老年人组织、居民参与，实现老年人自助与互助的局面。除此之外，老年人邻里结对帮扶，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助失能老人已经成为常态。

3. 构建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养老服务的传递成效。互助养老的理念就是在赋权增能的基础上，激活老年人自身的潜能，带动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的发展。（1）D 村幸福院充分发挥老年人优势，为老年人搭建互助互利的

平台。村里有许多老年人拥有良好的传统美食制作手艺,幸福院将这些能人骨干组建起来,通过小组工作的方式,成立美食合作社,并为其搭建宣传平台和销售渠道,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这一做法使得老年人在幸福院不但能够享受服务,还可以创造价值,他们的幸福感得到不断提升。(2)“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有助于塑造“敬老、爱老、孝老”的风气。每年年初,D村幸福院联合村内的幼儿园举办一场尊老敬老活动,邀请全村500多名老年人参加。2019年的重阳节,D村幸福院收到村内企业的爱心捐赠,为村内特困老人发放过节费。平时他们生病住院,每人还有200多元的慰问金。(3)“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倡导志愿精神、敬老精神,以满足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需求,志愿行为回报效果提高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在社会参与层面一定程度减少了对老年人的歧视,还可构建家庭、朋辈群体以及志愿者团队等非正式支持网络,作为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等正式支持的补充,逐渐完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系统。

四、权能衰退: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困境

在调查中,21.9%的老年人表示不愿意成为老年人志愿者去帮助有需要的老人,但是有64.3%的老年人希望村里能够实现老年人互相养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老年人的互助意识很薄弱。从养老方式来看,家庭养老占比50.4%,自我养老占比33.0%,社区养老13.9%,而机构养老仅为0.7%。可见在D村老年人以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重视子女养老,而对于互助型的社会养老服务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D村在推行互助养老服务过程中,老年志愿服务的资源比较匮乏、老年人由于健康风险的累积对健康维护的需求又日益迫切,而他们在对于参加互助养老的心态又是与家庭养老的观念存在一定张力。这些因素使得农村老年人权能衰退的

形势比较严峻。

(一) 互助养老服务资源的匮乏

由于缺乏有组织的互助互济及相关制度建设,导致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1)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难以制度化和专业化。从互助内容看,互助养老服务多数以志愿服务为主,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很少,在社区范围内缺乏制度化运行。志愿服务仅仅停留在聊天、读书看报、打扫卫生等层次。(2)农村社区养老的场地往往是日间活动中心,存在设施不完善、缺少餐厅和床位、缺乏相关的医疗配套措施等问题。这种现状达不到开展互助养老服务的条件,导致互助养老服务成效不好。(3)幸福院互助养老的服务系统的相关配套制度有待拓展和完善。目前幸福院往往位于行政村或中心村内部,对于距离行政村较远的老人,参加幸福院互助养老存在出行不便和交通安全问题。

(二) 老年人健康风险的叠加

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风险表现为:慢性疾病的“长期潜伏”、“不期而遇”的重大疾病、“机能退化”的肢体残疾等^[22]。老年人健康风险的累积对老年生活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健康风险管控的可行能力退化、健康防控意识淡薄、医疗卫生资源不足等劣势的累积,导致老年人的权能衰退,对生活的满意度下降,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都不足以维系“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当前农村老龄化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失能老人缺失家庭照料,通常情况是老年人夫妻之间相互照料,若一方去世,可能就依靠子女照料。但是由于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家庭空巢化现象以及代际赡养义务的弱化,失能老人会处于不利的境地,生活质量较差。当前,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不能有效地得到回应。“D村老年人口互助养老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一些老人希望能够为其打扫卫生、量血压、看病。个别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助餐的需求,目前幸福院无法提供,也没办法做到,偶尔帮助失能老人做一些饭菜是可以的,长期做不到的”^①。失能老人在互助服务的过程中是极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在无法满足其需

① 对D村老年协会会长的访谈。

求的情况下，会提供一些短期、应急性的服务内容，但是这样并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使得老年人互助服务受到了限制。

（三）传统养老心态的束缚

D村老年人多数与家人住在一起，以自我养老为主。（1）受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闽南地区特别强调子女（尤其是儿子）养老以及自我养老，对新型的互助养老认知有限，部分老人对开展互助养老服务持怀疑态度，对低龄老人花费时间和精力照料高龄老人，将来未必能换回同等质量的服务表示担忧。在D村，参加互助养老服务的人数有限，一方面，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当前养老服务活动的单一性，健康老人对社区服务、志愿者服务缺少感情基础和应有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文化互助和老年餐桌的参加人群覆盖面有限。（2）受“恩往下流”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低龄老人在身体健康许可的条件下，仍然继续为子代承担家庭责任。低龄老人（60—70岁）可能由于身体还比较硬朗，外面有就业机会，忙着挣钱，或者帮忙带孙辈或者负责家庭的三餐。另外，农村地区对于子女不孝的道德约束，使得村内一些老人在参加“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时候有所顾虑。由于老人子女担心家中老人参加了互助养老，会被村里人视为“不孝顺”，因而一些老人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持排斥态度。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导致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认为，养老就是子女应该在老年人身边尽赡养的义务。

（四）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对接的错位

（1）农村地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发展，以简单的日常家居服务为主，如洗衣、做饭、理发。然而，对于那些生活不富裕、子女不在身边、身患疾病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还需要专业服务层面及心理层面的需求。目前，这种需求的缺失导致这些老年人产生一种严重的权能丧失感、孤独感和无助感，阻碍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2）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难以形成类似“时间银行”的机制，光靠村级幸福院的运作，在自然村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容易导致需求与服务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时效性弱化的问题。由于农村地区各个自然村分散，提供

服务的空间距离较远，很多老年人的需求从各个自然村反映到村居或者社会工作机构，村居或者社会工作机构再从行政工作或项目中分身出来想方法应对，依托幸福院实施，这个过程中老年人需求的时效性难以呈现，从而导致各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效果弱化。（3）对于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幸福院互助养老服务的规范性不足。当前互助养老刚刚起步，政府在互助养老的政策设计、资金投入和相关立法建设比较滞后，使得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在偏远地区缺少应有的规范。一些农村只能依托现有的老年协会、幸福院推行互助养老。在发展互助养老的实践中，缺少成熟的经验和对标典范。（4）幸福院互助养老的服务系统的相关配套制度有待拓展和完善。目前互助养老内部运行机制主要靠道德约束，缺乏互动与激励机制，由于缺乏互助养老的管理制度、模式标准以及约束机制，在设施标准、运行保障机制和效果监督机制等方面都无法按照制度有效地进行，必然会影响互助养老的持续发展。

五、多元化赋权：创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路径

针对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遭遇的老年人权能衰退困境，基于赋权视角，从资源、观念和制度3个维度，探索创新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路径。

（一）资源赋权：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序发展的催生动力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需要政府从资源方面给予赋权。资源赋权既包括配置性资源的赋权，也需要权威性资源的赋权。（1）政府应基于国情、社情，合理界定“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相关内涵，对运营“时间银行”模式的责任主体的权责加以明确，从上至下保障该模式的长效机制，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只有当大众认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价值，其发展才会得到支持。政府层面应针对农村地区“时间银行”发展模式特性，对该模式的功能定位有明确的引导。借鉴英、美、日等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根据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农村地区当前发展

阶段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保障制度。(2)对农村地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做法,加以总结提炼,给予正面宣传,形塑尊老敬老的互助养老文化惯习。如借助重阳节、端午节等节日,开展老年人互助服务,倡导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健康老人为失能老人服务,借活动的成效来让老年人认识到互助养老服务能够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同时,通过党建引领,打造农村互助养老的典范,建立推动农村互助养老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员干部示范性的表率作用,建立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的服务模式,使老人真正体会到互助养老模式的实惠,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提高他们参与互助式养老模式的积极性。(3)政府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养老专业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针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知识匮乏,可以链接高质量的专业服务资源,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针对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可以通过链接资源与医学院、卫生院合作,以健康知识讲座、义诊活动、小组活动的形式提升他们的健康意识和知识,协助他们增强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使其达到“老有所医”;对于空巢老人,将其聚集起来,从预防老年人被骗、老年人手工小组、广场舞、健身操、传统节日的敬老活动以及为老年人举办生日会等方面入手,形成固定的老年志愿者队伍,搭建老年人互助互乐互养的平台,增强相互间的心理慰藉和熟识度,丰富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使其达到“老有所乐”。

(二) 观念赋权: 激活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内生动力

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核心是农村互助意识的增强,激活老年人守望相助的认知,充分发挥农村老年人力资源,将相互间零散的互助行为有效地组织起来作为主要服务力量,让老年人走出家庭,融入社会。(1)积极倡导老龄群体是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念,将老年人“老而无用”的观念转变为“老了仍能发挥余热”,宣传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丧失、权能衰退导致的不适应,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2)对有意愿参与农村互助

式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进行甄选、招募,对他们提供服务方面的技巧开展培训,对于参与互助式养老的老年人,需要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要以“守望互助”为组织使命来开展服务。(3)通过深入挖掘农村地区有意愿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人群,以个人身体状况、家庭抚育状况为出发点,优先引导党员和健康状况良好的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起到示范作用,对于老年人“走出家门”给予更多的鼓励,以一种积分见证的形式树立老年志愿者的形象,通过表彰、每月总结的形式对其积极参与的行为给予认可,激活其他老年人群体的权能意识,进而促进“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动力形成。

(三) 制度赋权: 培育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推行动力

(1)建立农村志愿者积分制度。志愿者组织建设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的核心。在农村地区,除了留守老人之外,留守妇女也是一大重要人群。发展老年人志愿者组织,可吸纳留守妇女主体进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农村年轻妇女力量的注入,可以建构“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信任机制,提高老年人对于所兑换服务可靠性的信任程度,让老年人看到自己参与志愿活动支付时间能获得“被服务”时长,激发他们的潜能以及改变现状的信心。对储存时间多、服务质量好的志愿者,给予精神奖励并搭配适度的物质奖励及时予以褒奖,也可为其购买意外险来提高其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热情。(2)建立和完善互助养老服务的积分兑换机制。“时间银行”养老有偿激励机制,使得参与者对自己的延期劳动收益有一个可视化的心理预期,这样“去货币化”过程会给参与者带来荣誉感以及与他人账户数额的一种良性竞争。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实行“82”兑换模式,即80%的时间存款可以支取等质量的志愿服务,20%的时间存款可以支取生活物品。这样多元的兑换规则缓解了“时间币”转移接续的困难,为一部分认为自己提供服务与支取服务的间隔太长的低龄老年人提供了另一种兑换渠道,有利于“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在农村全面推开。(3)搭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积分使用和继承机制。采取弹性管理办法维持“时间银行”

养老模式通兑作用的长效机制，个人储存时间的支取范围放宽至三代亲属之内，这样能刺激休假返乡的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之后，将其积分转让给自家的老人，为其提供精神层面的慰藉。这样保障了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人群的权益，有利于该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4）搭建“志愿者+社区+第三方机构”的共治平台，改变传统上手工计时的不足，让第三方机构建立核算“时间银行”服务量的专业管理系统，将整个“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过程规范化、系统化。同时，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针对农村社区居民文化、技能弱势的特点，进行系统培训，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和责任感，间接地促进了被服务老年人的满意度的提升。

六、结 语

综上所述，赋权机制下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整合传统的农村内生性资源，理顺互助养老的机理，激活老年人参加互助养老的主体性，催生农村“时间银行”的文化氛围，构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运作成效。农村地区在推行互助养老服务的实践中，存在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资源匮乏等问题，使得农村地区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遇到瓶颈。对于老年人而言，权能衰退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意义上认为，因为身体机能退化，老年人呈现出“弱者”的角色。但老年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经验以及智慧，往往被忽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赋能，激活新型的互助养老的发展动力，促进老年人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作出新贡献”^[3]。从这个意义讲，基于赋权机制，创新“时间银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发展，是实现农村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重要依托。从赋权的角度，资源赋权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序发展的催生动力；观念赋权激活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内生动力；制度赋权培育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推行动力。这对于

充分利用农村老年人的优势，挖掘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化养老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报告. 预计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 97 亿 [EB/OL]. (2019-06-18) [2021-01-16]. https://www.sohu.com/a/321387829_114988.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EB/OL]. (2019-11-21) [2021-01-16].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21/content_5454347.htm.
- [3] 习近平.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B/OL]. (2016-05-28) [2021-01-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
- [4] 钟仁耀, 王建云, 张继元.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1): 22-31.
- [5] 陈功, 黄国桂. 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发展、实践与创新: 兼论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之新思路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6): 111-120.
- [6] 李明, 曹海军. 老龄化背景下国外时间银行的发展及其对我国互助养老的启示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 (1): 12-19.
- [7] 邓志峰. 关于我国互助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建设的思考 [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17-21.
- [8] 陈功, 王笑寒. 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 理论学刊, 2020 (6): 132-140.
- [9] 陈友华, 施旖旎. 时间银行: 缘起、问题与前景 [J]. 人文杂志, 2015 (12): 111-118.
- [10] 纪春艳. 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 [J]. 理论学刊, 2020 (5): 140-148.
- [11] 陈功, 吴振东.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时间银行”演变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 117-126.
- [12] 刘妮娜.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与运行

- 机制探析 [J]. 人口研究, 2019, 43 (2): 100-112.
- [13] 李俏, 孙泽南. 农村互助养老的衍生逻辑、实践类型与未来走向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2): 1-10.
- [14] 老年歧视 [J]. 中国护理管理, 2018, 18 (4): 487.
- [15] 穆光宗. 丧失和超越: 寻求老龄政策的理论支点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4): 45-53.
- [16] 钟涨宝. 农村社会工作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78.
- [17] 何雪松.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290.
- [18] 张欢欢, 陶传进. “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以S公益项目为例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 (3): 161-168.
- [19] 袁志刚, 陈功, 高和荣, 等. 时间银行: 新型互助养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J]. 探索与争鸣, 2019 (8): 4-36.
- [20] 高和荣, 张爱敏. 中国传统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及其时代价值: 基于闽南地区的调查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 (4): 42-46.
- [21] 孙奎立. “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 [J]. 东岳论丛, 2015 (8): 91-95.
- [22] 孙文中, 刁鹏飞. 生命历程与累积劣势: 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健康风险研究 [J]. 学术探索, 2018 (12): 62-68.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Time Bank” Mutual-aid Elder Service in Rural Areas

SUN Wen-zhong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ime bank” mutual-aid service for the aged is a new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apacity decline” in the rural areas in China. Due to the declining capacity of the elderly, ageism and the weak accumul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time bank” mutual-aid service has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volunteer service resources, the increasing health risks of the senior, the constraints from the mentality of family elder care, and the inadequate effectiveness of mutual-aid service.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s, initiative and results to promote the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bank” mutual-aid service, to activate its endogenous impetus, and to foster its implementation impetus, this paper suggests measures to ensur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h as making top-level design, advocating the role model effect, integrating the strength of women volunteers, developing the “82” exchange model, and creating an inheritance and transfer mechanism. The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uaranteeing a comfortable life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for promoting equal and inclusive bas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capacity decline; empowerment mechanism; time banks; mutual-aid services for the aged

(责任编辑 冯庆福)